

# 进外交部担任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翻译

## 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二)3

由香港新华社和亚洲公司派员全程陪同,寸步不离,以防遭蒋特特的袭击绑架。

经过罗湖关口,迎接我们的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嘹亮欢快的歌声,我精神为之一震,情绪激动,热泪盈眶。亲爱的祖国,我回来了!

到了北京,外交部给我一个月的假期。

有位先期回来的机要员陪我到处逛。北京大小餐馆几乎尝遍了。除了骑自行车,我还必须学会乘搭公交车,辨明方向。北京人不说向右拐或向左拐,而说向东或向西,向南或向北。吃饭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还有外汇券等等,这些够我熟悉一阵子的。

我第一次到外国语学院看望瑞玲,中午就在学生食堂吃饭。我不知道一碗饭算几两。瑞玲帮我打饭,满满一饭盒米饭和大半盒素炒四季豆,我以为是两人的分量。瑞玲说,这是给你的,四两饭一份菜。瑞玲发现我的踌躇,于是两人便分着吃。

后来我到饭馆吃饭,就有了经验。每次要一两,最多二两米饭足矣。

我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通知两件事:第一,我被分配到亚洲司印尼处工作;第二,要我到财务司办理有关财务的手续。

我的行政级别定为20级。办事员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意见。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20级领70元工资,而大学生毕业为22级,56元工资。

没想到,上班后没几个月,在一次全司大会上,我受到司领导的点名表扬,说我能够正确对待名利,等等。我当时确实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没有思想准备。

接着司领导说,不像xxx同志,同是从印尼使馆回来,不接受20级,要求干部司给他19级,组织不同意,他还闹情绪。虽然组织上最终满足了他的要求,但这种向组织伸手要名要利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一褒一贬。这位同志深受教育。后来在印尼处处务会上还做了自我批评,受到同志们的欢迎。

陈毅外长一再谆谆告诫同志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莫向党伸手,伸手定被捉。



当时的外交部东楼

我一直铭记着陈总这一谆谆教导,并努力践行。

有一天,我在外交部与许天林、张琼郁邂逅。前者原任驻棉兰领事、时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方语系党支部书记,后者老先达人、原任驻印尼使馆印尼文翻译,时任外语学院印尼文系主任。他们是来向干部司要求把我调到外语学院去,但干部司不同意,让他们扫兴,无果而返。

当时陈丽水先生已经分配到外语学院教书。我很同情琼郁的苦衷和难言之隐。后来,他向我索要我在驻印尼使馆编撰的专门教授外交官的印尼文外交用语教材,我慨然允诺并亲自送上门。

张琼郁是先达老前辈。他和陈丽水是第一批被王任叔大使招到大使馆的先达人。他在文化处,负责编发使馆新闻公报和文化参赞的翻译工作。

琼郁为人真挚,平易近人。他很早离开先达,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在使馆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他是我可以谈心的长辈之一。

他的印尼文和中文造诣较深,字也写得很好,颇受司马文森参赞的赏识。

每逢节假日,我和瑞玲还经常到外语学院(瑞玲母校)看望他们,交情甚笃。

经组织批准,我和瑞玲1963年8月27日登记结婚。28日晚在外交部雅宝路招待所新房里略备些糖果和熟食,接

受瑞玲俄语系一些同学和闻讯赶来的驻印尼大使馆政务参赞赵政一和翻译许源明等的祝福。新房则由即将赴泉州华侨大学念书的树西妹妹稍加布置,没有司仪也没有仪式,简单朴素,挺好。

外交部是国务院首席大部。当时是在东单外交部街清末留下的一座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建筑群里办公。据说,这是清朝为迎接德国皇帝来访而修建的。

两扇大红门,竖立的白底黑字外交部牌子和站岗的警卫员,这就是我跨入外交部大红门最初得到的深刻印象。很可惜,这幢历史建筑已被拆除。

进入外交部,顿觉其氛围与大使馆很不一样。这里有长征干部、老八路、白区长期卧底的情报干部、有解放前各著名大学培养的学生领袖、新旧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国际法专家和小国语种的华侨干部,可谓精英荟萃。

能在这样一个革命大熔炉里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说是“三生有幸”。我特别珍惜这段经历。

我在印尼处的工作是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印尼文翻译、起草照会和请求报告、撰写有关印尼的形势分析报告,负责保管文件档案等。工作繁重。但与同志们的合作相处都很融洽,心情愉快。

印尼处编制究竟有多少人,搞不清楚。一线干部流动性很大。有的下放农村搞“四清”,有的借调到外单位、有的进修。经常上班的仅六七十人,全是男性。华侨出身的干部,约占一半。副处长出生新加坡,曾参加马共。解放前回国学习,后转为中共党员。处长罗进,部队出身的干部,为人忠厚诚恳,善解人意。他文化水平不高,很尊重知识分子,善于调动大家积极性。

1964年12月,瑞玲分娩期将至,我不在北京,陪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印尼。

临走前,我拜托罗处长关照瑞玲。

当我们回抵昆明时,我在宾馆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罗进打来的。他向我报喜说,瑞玲已于12月9日顺利产下一个男孩,母子健康无恙。我激动不已。

我很感谢罗处长派车并亲自把瑞玲送到医院,也很感谢先达校友郑南风对瑞玲和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

有些重要外交照会和讲话稿,司里完成不了。章文晋司长便带着我,晚上到乔冠华副部长家请教。乔是著名写手。毛主席曾说,党内有两支笔,南乔北乔。

南乔指的是乔冠华,北乔是胡乔木。

到了乔府,并没有马上进入正题。乔老爷(人们对他的昵称)喜欢喝点酒,边喝边聊。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聊着聊着,到了下半夜,乔的腹稿便出来了。

我马上把乔口述的意思落实到文字上。除了基本情况事先已草拟好,乔口述的是照会的灵魂,是政府的表态。有了初稿,乔就会在初稿基础上,字斟句酌,或让我推倒重来,或让我把有关段落和句子重组一遍,或他自己动笔加以润色、定稿。

总之每一次参加写稿,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提高。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特别用心。

乔部长经常说,一篇好文章或讲话稿,不可能通篇都是新话。有几句新话,精采的话,它们就能立得起来。写文章切忌满篇套话。毛主席写文章不落俗套,很值得大家学习。

1964年底,印尼宣布退出联合国。翌年1月23日,苏加诺总统派遣苏班德里约副总理率庞大代表团访华,以期获得中国的大力支持。

我们到乔府草拟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讨论如何评价印尼退出联合国的行动及其国际影响,如何接待好苏班德里约代表团等。

由于时间紧迫,第二天凌晨,外交部领导决定将我手写的请示报告(已来不及打印)直接送中央审批。

我记得,毛主席在请示报告上用铅笔写了一大段批示,十分珍贵。但至今该档案尚未解密,无法与读者分享。

有一天深夜,外交部机关四清办公室有两位同志到外交部招待所来找我,要我出示财务司给我开的存款条子。他们看了以后说,你的存款不只这些,并嘱我尽早到财务司领取新的存款条子。

当时,外交部正在开展四清检查,财务司是重点。我在驻印尼使馆工作时,每月用不完的工资都由使馆会计转存外交部财务司,其间并没有履行任何登记或转帐手续,加上我这个马大哈,对钱的事不上心,就给坏分子有空子可钻。

我很感谢组织上为我追回这么一笔钱,并给犯错误的同志应有的惩罚。

1964年10月初,干部司安排我到唐山西葛庄搞四清,为期4个月。这是我下放农村,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识农村,体验农村,锻炼身心的极好机会。

白天,房东带我们和生产队一起榜玉米地。晚上我们找房东和老乡唠嗑,了解村里情况。按四清队部署,这是第一阶段:摸底。

广大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但依然十分贫困。就房东一家来说,粮食够吃,但经济拮据,平日买油盐酱醋都困难。我们每月给他30元,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农民下地都喝井水。多数井里都有翻白肚的死青蛙。不到两周,我就患严重痢疾。所幸我随身带着治痢疾的特效药,很快就止住了。

大约11月5日,四清队接